

西方文学名著选粹

# 红与黑

司汤达



52  
3

雨果著

# 红与黑

雨果著



西方文学名著选粹

# 红 与 黑

[法] 司汤达

主编 张月超

原译 郝 运

编选 仲 文

**红与黑**

【法】司汤达

仲文 编选

---

出版：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125 字数 93,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560册

---

ISBN 7-5346-0194-0

---

1.56 定价：1.20元

责任编辑：王建一

## 总序

西方文学，自希腊、罗马以来，名著~~版本~~，可谓汗牛充栋。用心地研读它们，不仅可以学到丰富的知识，而且也能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我本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多年，从中得益匪浅，很希望当今的年轻人也能系统地多读名著，以增加知识，提高鉴赏水平。

想了解和学习文学名著，首要的是去读，读原著，读优秀的译本。只有真正去读了，才能进而去领会，去思索、去把握，才能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以真正从中吸取到养分。我常常向我的研究生及其他外国文学爱好者引述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的名言：“要去读莎士比亚的原作，而不是去读关于那些剧作的评论”。这个告诫确很中肯，对青少年和一般的过于忙碌、无暇读原著者，是一个诚挚的训导。

为了帮助青少年和广大读者在当代快速生活节奏中尽可能地多读西方文学的优秀著作，我和我的研究生还有其他几位从事文学研究的同志，编了这套《外国文学名著选粹》系列丛书。这套书完整地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学从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品。选目根据《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辑》（这在西方是通用的文学教材，较具权威性）、《大英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等书，经反复磋商而定。“选粹”之意，其一，在于对西方文学名著的众多书目进行精选；其二，在于对三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名作，作适当删节，尽力留存其精华，以飨读者。这套选粹丛书不同于以往各种西方文学名著的简写、缩写本之处在

于：尽力保持原著风貌，不对原著作任何文字上的改写（删节后编者所加必要的衔接文字，加括号、换字体排出）。所选译本均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新且公认最佳之作。每本删节后约十万字左右。这套书对广大青少年、外国文学爱好者和外国文学工作者很实用。参加这套书编选工作的，都是在外国文学方面训练有素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他们和我都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尽管有些人会因为它“善”小而不为。因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以往外国、中国都不大有人做过，因此丛书之中，疏陋之处，恐难避免，还望读者指正。

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 张月超

我非常感谢张月超教授对我的信任，让我为这套书作序。我与张月超教授是老朋友了，他为人谦和，学识渊博，对外国文学研究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文章也写得非常有文采，我对他所写的文章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这次他要我为这套书作序，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愿意。这套书的选材非常广泛，涵盖了从古至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每一篇都经过精心挑选，质量非常高。这套书的翻译也非常准确，能够很好地传达出原文的神韵。这套书的编辑也非常用心，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到位。这套书的装帧也非常精美，让人一看就非常喜欢。这套书的出版对于推广外国文学，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非常期待这套书的出版，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一本非常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集。

## 司汤达与《红与黑》

司汤达（1783—1842），原名马里·亨利·贝尔，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主要文学作品有：《阿尔芒斯》（1827）；《红与黑》（1830）；《吕西安·娄凡》（未完成）；《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1838）；《巴马修道院》（1839）；《意大利遗事》（1855）。另有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关于红与黑》（1832）等。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红与黑》是欧洲第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司汤达一生文名寂寞，身后却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伟大的俄国作家高尔基曾把他与巴尔扎克相提并论，称他为真正的天才艺术家，形式的巨匠。

《红与黑》是个象征性的书名。正如后世的象征主义者所说，它犹如“面纱后面的美丽的双眼”，若隐若现，十分耐人寻味。一般认为，《红与黑》中的“红”指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抗复辟制度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者于连；“黑”指包括反动教会、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黑暗势力。司汤达在《红与黑》下面注的副标题是：“一八三〇年纪事”。这一年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激动人心的革命风暴消失了，叱咤风云的拿破仑一蹶不振。封建贵族卷土重来，建立了波旁王朝。在《红与黑》中，司汤达首先选取了法兰西社会的典型窗口维里埃尔城来表现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的政治斗争。贵族出身的德·雷纳尔市长是复辟王朝在这里的最高代表，他把维护复辟政权，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政治上得势视为天职。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原是小市民，由于投靠天主教会的秘密组织圣会而获得了肥差，从而把自己同复辟政权拴在一起。副本堂神父玛斯隆是教会派来的间谍；一

切人的言行皆在其监视之下。他是反动教会势力的代表。这三人构成的“三头政治”，反映了复辟势力在维里埃尔独揽大权的局面。而他们的对立面，是为数甚众，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对反动教会的揭露，是《红与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贝藏松神学院是天主教会的缩影。青年人的身心在这“人间地狱”里遭到粗暴的摧残。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组织起严密的圣会网，“他的那些送往巴黎的报告使法官、省长，甚至驻防军队的将级军官都胆战心惊”。神学院内宗派相煎，密探猖獗。司汤达愤怒地斥责了那些扮成上帝使者的伪君子。“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是《红与黑》所展现的政治画卷的中心，而秘密会议又是这中心的核心。拉莫尔侯爵是弗朗什-孔泰省最富有的地主、世袭贵族。他出入于宫廷，是极端保王党的头子。他预感复辟王朝岌岌可危，急忙召集会议，密谋应变。出席秘密会议的十二个人，代表保王党的各方意见。他们决定让首相离开内阁，由前台转入幕后，制造假象，缓和矛盾；同时筹措资金，组织教会武装，为外国军队“打开法兰西大门”，企图以外力扼杀革命，重建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

就是在这刻划得极其出色的典型社会环境中，司汤达安排了小说主人公于连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于连·索雷尔是一个木匠出身的锯木厂老板的儿子。在一个老军医的熏陶下接受了启蒙的学说，向往拿破仑时代沸腾的生活，渴望挤进上层社会，将来能入军界。但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下了这样的生活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生活。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儿时的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洁身自好，离群索居。于连则迥然不同，他决心实现自己英雄的梦想。为此，

他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了斗争。

于连对社会的反抗是以曲折的方式进行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四十岁左右的神父就能拿到几十万法郎的薪俸，遂决心隐瞒自己的观点，准备沿着神父——主教的阶梯向上爬。尽管他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却把宗教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于连的性格很复杂，既具有反抗性又有妥协性、依附性，即虚伪又诚实，既冷酷又热情，惊人的对立在他的性格中得到了惊人的溶合。

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于连处处感到被压抑的痛苦，对社会差异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为自己的生活感到绝望苦闷，更为自己的失意而图谋报复，对贵族社会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在德·雷纳尔市长家，他潜心观察社会，痛恨德·雷纳尔、瓦尔诺这些“刽子手”、“社会的蠹贼”，对“不合理的社会满怀愤慨”，憎恨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蔑视贵族阶级的“合法的权威”。于连的孤高自傲与市长大人的目中无人相碰撞，于连的反抗性一触即发。而市长的暂时退让，更增添了于连反抗的勇气，也激起了他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于连的反抗性又是以贵族社会对他的态度来决定的，因此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妥协性、软弱性和依附性。在德·拉莫尔侯爵府，侯爵夫人、小姐，甚至仆人都在等着看于连这个乡下人的笑话，这给了于连强烈的刺激。他毫不示弱，以更轻蔑、高傲的态度回报他们。毕竟，以个人反抗社会，总会有寡不敌众的感觉，一旦侯爵对他竭尽拉拢利用之能事，信任他、重用他，于连就感恩戴德，为他效力而不顾惜性命。

于连对社会的反抗，还以性格中的虚伪矫饰曲折地表露出来，这是反抗性的异化。可以说，是贝藏松神学院使于连的虚伪矫饰得到了“锻炼”。于连不信宗教，不喜欢神父，不相信来

世，相反倒是喜欢世俗的享乐；但为了混迹于上流社会，他却装成虔诚的教徒，一味盲从，为自己偶然露出的思想家神色而实行自我惩罚。这种双重生活，使于连的精神十分痛苦，但换来了主教的恩宠和神父的器重。在阴谋和伪善的巴黎，于连长期训练出来的虚伪矫饰有了用武之地。侯爵表面上对于连很平等，实则想看乡下人受恭维后的傻相。于连明知这点，也就将计就计，裝作不知道。渐渐地熟悉了巴黎的生活艺术，把自己裝扮成花花公子，对侯爵隐瞒无神论者的身份和对拿破仑的崇拜，一步步得到侯爵的欢心和重用。

如果我们脱离了时代、社会的条件看于连，那他无异于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但于连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人物性格的缺陷根源在社会本身，人物是无法摆脱周围环境影响的。在查理十世的统治下，打出鲜明的旗帜反封建特权是不可能的，小资产阶级只得采取个人奋斗方式，戴上假面具，走曲折的反抗道路。于连看透了封建道德的虛偽，他以不道德的手段反对一个本质上不道德的社会，以恶抗恶。他敢于蔑视封建道德，大胆承认自己的虛偽，声明自己是小人，对比贵族阶级的伪君子作风，又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诚实。

于连的两次爱情，是对上层社会的复仇行为，也是他性格复杂性的进一步体现。于连与雷纳尔夫人、拉莫尔小姐最后都产生了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爱情。但雷纳尔夫人与拉莫尔小姐思想不同，性格迥异，在前者那里，我们看到了于连美好、善良的一面，真挚的爱情最终战胜了占有欲；而从后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于连野心、虚荣的一面，人类的情感终于被疯狂的征服心理淹没。

对于雷纳尔夫人，于连开始产生的只是清醒的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与英雄主义的责任感相混合的占有欲。雷纳

尔夫人是一个温顺善良的妇女，丝毫没有贵族阶级的自命不凡、矫揉造作。在认识于连以前，生活是平静安适的，但精神上又是贫乏的。于连非凡的勇气和独特的个性都使她敬慕。然而于连不仅不爱她，而且恨她、轻蔑她，甚至戏弄她。他要征服雷纳尔夫人，并把这一举止看成是对她那个特权阶级的复仇。但天长日久，于连“实在看不出她的虚伪和夸张”，特别是当于连知道了她承受着巨大的内心压力和自我牺牲时，被深深感动了。德·雷纳尔夫人唤醒了冷酷的于连火一般的热情，使仇视一切的于连看到了世界上的光明。

于连与拉莫尔小姐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矛盾中发展的。拉莫尔小姐出身高贵、生活优越、冷酷而高傲。她拥有一切，缺少的只是幸福。她需要刺激，于连对她来说也确实够刺激的，她第一次遇到一颗拒绝向她低头的心。拉莫尔小姐从那班贵族子弟的精神空虚中，看到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她怀念祖先，每到忌日就服丧，从于连那儿，她看到了顽强的意志、性格和蕴蓄着的能量，也看到了下一次革命的阴影。她是统治阶级中精神性格上的变态人物。说到底，她追求的不是爱情，而是野心和虚荣。可恰恰是这一点，赢得了于连的心。她美丽的容貌和反复无常的性格，又激起了于连疯狂的报复心和占有欲。拉莫尔小姐使于连的野心更加强烈，靠着她的裙带关系，于连开始步步高升了。然而好景不长，雷纳尔夫人受了宗教的欺骗告发了于连，于连由于一时的冲动，枪击了雷纳尔夫人，事后又后悔不已。最后得知她并未丧生，又暗自庆幸。于连到死也没有改变对雷纳尔夫人的爱。

于连因枪击雷纳尔夫人而入狱，他拒绝律师的辩护，拉莫尔小姐的周旋安排，雷纳尔夫人的苦苦哀求，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希望已经破灭，精神早已死亡，肉体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

义。于连的死是符合他性格发展的。在法庭上，于连以贫民的身份向波旁王朝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即使我的罪比较轻”，“他们还是要借着惩罚我来杀一儆百，使这样一种年轻人永远丧失勇气，他们出生在一个卑贱的阶级里，可以说是受着贫困的煎熬，但是他们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大胆地混入有钱人高傲地称为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我在陪审官席上没有看到一个变富裕的农民，仅仅只有一些愤怒的资产阶级……”

于连的悲剧，是复辟时期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命运的概括。于连身上那股充沛的精力、那付傲视一切的态度和沉着应变的心理特征，反映了当时广大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不甘示弱，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于连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他身上闪耀着反封建、反特权，追求人类平等的光采。

《红与黑》的巨大魅力，在于它成功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司汤达把人物性格的发展与人物活动的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强调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与发展的影响。通过对促使于连性格发展的典型环境（唯利是图的维利埃尔、地狱般的神学院、阴谋与伪善的巴黎）的描绘，不仅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了合理的依据，而且使整部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司汤达采用传统的个人传记形式，选择日常生活和政治斗争中的典型事件，一环扣一环地逐步展开个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背景广阔，情节集中，结构严谨。在人物刻画上，司汤达擅长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细致地描写人物在特定情景下的心理状态，分析他们的欲望和感情的细微变化，揭示人物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斯汤达的心理分析，为后世作家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 仲文

维里埃尔这座小城可以算是弗朗什-孔泰的那些最美丽的城市中的一座。它的红瓦尖顶的白房屋散布在小山的斜坡上，一丛丛茁壮的栗树把山坡每一个细小的起伏都显示出来。杜河在它的城墙下面，离着几百尺远的地方流过。

维里埃尔的北面有高山做为屏障，这是汝拉山脉的一条支脉。维拉山的那些锯齿状的山顶从十月出现初寒的日子起就盖上皑皑白雪。一条湍急的流水从山上冲下来，在投入杜河前流过维里埃尔，向许多木锯提供了动力。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工业，给大部分更象农民而不象城里人的居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舒适。然而使这座小城富起来的并不是木锯。普遍的富裕还要靠生产那种叫牟罗兹布的印花布，自从拿破仑垮台以后，就是靠了它，几乎维里埃尔的每一所房屋的正面都整修一新。

您一进城，立刻就会被一架声音很响、看起来很可怕的机器的轰隆轰隆声震得头昏脑胀。二十个沉重的铁锤落下去，那声音震得石块铺的路面都跟着抖动。湍急的流水冲下来，转动一个轮子，把这些铁锤举起来。每个铁锤我也说不清一天可以制造几千枚钉子。旅行者进入维里埃尔，如果打听这个制钉工厂属于谁，它把沿着大街往上走的人耳朵都震聋了，就会有人用慢吞吞的腔调回答：“啊！是市长先生的。”

维里埃尔的大街从杜河岸边向上一直通到小山顶，旅行者只要在这条大街上稍微停上一会儿，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个神情忙碌、态度傲慢的高个子男人。

一看到他，所有的人都连忙举帽致敬。他头发开始花白，穿

切人的言行皆在其监视之下。他是反动教会势力的代表。这三人构成的“三头政治”，反映了复辟势力在维里埃尔独揽大权的局面。而他们的对立面，是为数甚众，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

对反动教会的揭露，是《红与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贝藏松神学院是天主教会的缩影。青年人的身心在这“人间地狱”里遭到粗暴的摧残。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组织起严密的圣会网，“他的那些送往巴黎的报告使法官、省长，甚至驻防军队的将级军官都胆战心惊”。神学院内宗派相煎，密探猖獗。司汤达愤怒地斥责了那些扮成上帝使者的伪君子。“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是《红与黑》所展现的政治画卷的中心，而秘密会议又是这中心的核心。拉莫尔侯爵是弗朗什-孔泰省最富有的地主、世袭贵族。他出入于宫廷，是极端保王党的头子。他预感复辟王朝岌岌可危，急忙召集会议，密谋应变。出席秘密会议的十二个人，代表保王党的各方意见。他们决定让首相离开内阁，由前台转入幕后，制造假象，缓和矛盾；同时筹措资金，组织教会武装，为外国军队“打开法兰西大门”，企图以外力扼杀革命，重建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

就是在这刻划得极其出色的典型社会环境中，司汤达安排了小说主人公于连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于连·索雷尔是一个木匠出身的锯木厂老板的儿子。在一个老军医的熏陶下接受了启蒙的学说，向往拿破仑时代沸腾的生活，渴望挤进上层社会，将来能入军界。但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下了这样的生活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生活。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儿时的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洁身自好，离群索居。于连则迥然不同，他决心实现自己英雄的梦想。为此，

“我喜欢树荫，”德·雷纳尔先生回答，带着一点在对一个外科医生，荣誉勋章的获得者说话时显得恰如其份的高傲口气，“我喜欢树荫，我让人修剪我的树，是为了产生树荫，我不能想象一棵树还有什么别的用途，如果它不能象有用的胡桃树那样提供收入的话。”

在维里埃尔决定一切的正是这句伟大的话：“提供收入”。单单这句话就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

在秋天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德·雷纳尔先生让他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德·雷纳尔夫人一边听着丈夫神情严肃地谈话，一边提心吊胆地望着三个小男孩的一举一动。

“巴黎来的这位神气活现的先生，他一定会后悔的，”德·雷纳尔先生带着受到冒犯的神情说，脸颊比平时还要苍白。“我在城堡里也不是没有几个朋友……”

维里埃尔市长觉得如此可憎的这位从巴黎来的神气活现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想办法进入了维里埃尔的监狱和贫民收容所，而且还进入了市长和当地那些最主要的产业主尽义务管理的医院。

“可是，”德·雷纳尔夫人战战兢兢地回答，“既然您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地掌管穷苦人们的财产，那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又能怎样损害您呢？”

“他就是为了挑刺儿才来的，以后他会写文章发表在自由主义的报纸上。”

“您从来不看那些报纸，我亲爱的。”

“不过别人经常跟我们谈到这些雅各宾主义的文章；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分心，妨碍我们做好事。至于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原谅这个本堂神父。”

## 二

维里埃尔的本堂神父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过靠了这山区的新鲜空气，体格和性格都象铁打的一样坚强。应该说明一下，他有权随时视察监狱、医院，甚至贫民收容所。阿佩尔先生带着给本堂神父的介绍信离开巴黎，他考虑得非常周到，把到达这座居民们喜爱打听的小城的时间安排在一清早六点钟，而且立刻就到本堂神父的住宅去。

谢朗神父看了法国贵族院议员，本省最富有的地主，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信，陷入了沉思。

“我上了年纪，在这儿受人爱戴，”最后他低声对自己说，“他们不敢！”他立刻朝巴黎来的先生转过身去，尽管年纪已经很大，一双眼睛还是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表明他乐于从事一个多少带点危险的高尚行动。

“跟我来，先生，在监狱看守面前，特别是在贫民收容所的管事们面前，请您不要对您看到的事发表任何意见。”阿佩尔先生明白自己遇到的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跟随可敬的本堂神父参观了监狱、医院、贫民收容所，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得到的回答离奇古怪，他还是克制住自己，不流露出一点指责的表示。

这次参观，在维里埃尔这座小城里激起了各式各样充满仇恨的情绪。德·雷纳尔先生此时和他妻子发生小小的争论，也正是为这件事。早上他由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跟着，去找过本堂神父，向他表示最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保护，他完全觉出了他们话里的份量。

“好吧，先生们！我上了八十岁了，将是信徒们在这附近

一带看见的第三个被撤职的本堂神父。我来到这里已经有五十六年，城里的居民几乎都是我给他们行的洗礼，我刚来时这座城还只是一个小镇。我每天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从前我曾经主持过他们祖父的婚礼。维里埃尔就是我的家，但是我看见这个客人，心里想：‘这个从巴黎来的人可能真的是自由党人；眼下自由党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是他可能对我们的那些穷人和犯人带来什么损害呢？’

德·雷纳尔先生的责备，特别是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的责备，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好吧，先生们！让人把我撤职吧，”年迈的本堂神父声音发抖地嚷了起来。“我仍旧要住在本地。大家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块地产，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我可以靠这笔收入过活。我的职位没有带给我任何积蓄，先生们，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有人跟我谈到要剥夺我这个职位时，我才并不那么害怕。”

德·雷纳尔先生一向跟他的妻子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她一再战战兢兢地向他表示的这个想法：“巴黎来的这位先生，他可能给犯人们带来什么损害呢？”他眼睛看着就要发脾气了，谁知这时候她发出了一声叫喊。原来是她的第二个儿子刚刚爬上挡土墙的胸墙，尽管这道墙比下面的葡萄园高出有两丈，他还是在上面奔跑。德·雷纳尔夫人怕吓着自己的儿子，摔下墙去，不敢跟他说话。最后，这个为自己的英勇行为感到兴高采烈的孩子，朝母亲看了看，看到她脸色苍白，于是跳到散步道上，朝她奔过来。他给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个小小的插曲改变了谈话的方向。

“我一定要把锯木板工人的儿子索雷尔雇到家里来，”德·雷纳尔先生说，“让他照看孩子，他们变得太淘气，我们已经管